

《花凋》与《善良的乡下人》“女畸人”创作之平行研究

柯建华

(武汉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依据文化批评,对《花凋》与《善良的乡下人》进行平行研究,分析中外两位刻画“畸人”的女作家在女畸人创作寓意和创作手法上的异同。通过象征主义手法,张爱玲对丑陋身体的刻画揭示了女性活着的困境和无奈,批判的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摧残;奥康纳对身体丑陋的意象书写更像是宗教启示录,揭示的是丑陋的人性本身,借以探索现代社会人性迷失的疗救之途。

关键词 《花凋》;《善良的乡下人》;女畸人;平行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09)05-0132-04

Comparison between Withered Flowers and Good Country People

KE Jian-hua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Based on cultural criticis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female deformed characters created in Withered Flowers and Good Country People by analyzing the themes and the artistic techniqu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deformed characters. It points out that Miss Zhang is criticizing the unfair patriarchal society where women are subordinate, depressive and helpless while O'Conor, whose novel is more like a religious fable, is taking pains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us belief by revealing sins in human beings who are lost in this extremely materialistic world.

Key words Withered Flowers; Good Country People; deformed image; parallel comparison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奥尔德里指出:“比较文学最简单的定义可以理解为通过一个以上的民族文学的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或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的关系。”^[1]他将彼此没有直接联系的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称作纯粹比较,并将之分为“类同”和“对比”,即平行研究。

张爱玲是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文坛极富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弗兰纳利·奥康纳是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南方文学代表人物,被称为“地方性天主教作家”和“圣经地带”灵魂写手。两位女作家所处时代相同,且都擅长刻画畸形人物。本文选取张爱玲的《花凋》和奥康纳的《善良的乡下人》两部作品,依据文化批评,进行平行研究,分析这一东一西刻画“畸

人”的能手在女畸人创作寓意和创作手法上的异同。

一、不同的创作寓意

《花凋》和《善良的乡下人》都创作了未婚的女畸人形象,但女畸人的创作寓意却完全不同。《花凋》讲的是女性的生命悲剧,无法成为妻子的女主人公郑川端郁郁死去,反映的是张爱玲作为女性作者在作品中所渗透出的“地母”式悲悯情怀。她以一种悲剧意识建构女畸人形象,用这种悲剧结果、这种生死没有界限的混沌生活让读者向外张看,看看这个“合理”的男权社会昭示的无处不在的个体生命的残缺和无奈。张爱玲的女畸人,有着抹不去的悲观情绪,令人产生无限的同情。奥康纳则力图让人向内看,

让人不断审视自己的灵魂,她的女畸人隐含着一种希望,虽然这种希望只是瞬间的,并充满痛苦,但正是这种痛苦,使故事的主人公乔伊从混沌和愚昧状态中惊醒或顿悟,从而获得救赎。她们一个自觉,一个不自觉;一个仅停留在守望,以期人生的些许安稳,一个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

1. 生存的悲凉与人性之恶

《花凋》中的少女郑川端生活在貌似幸福的家庭里,她病逝后父母为她修葺了一个华丽的墓园。“无限的爱……永生的玫瑰……知道你的没有一个不爱你的”^{[2]134}。然而,现实中的川端是“一座没点灯的灯塔”。久治不愈的她临终前在李妈帮助下上街,趴在李妈背上的她像一个“冷而白的大白蝶”,到处有人用骇异的眼光望着她,仿佛她是个怪物。作者把川端化身为“冷而白的大白蝶”的怪诞描写强化了川端病中的丑怪:“她一天天瘦下去了,她的脸像骨格子上绷着的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了两只炎炎的大洞”。而川端病前是那样的健康、美丽,“一双华泽的白肩膀以及充满热情”^{[2]136}的眼睛。川端的那位“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2]145}的父亲认为把钱花在医药费上冤枉,不给她治病,听说川端要吃苹果,他生气地对妻子说:“现在是什么时世,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不起,她吃苹果!”^{[2]132}父亲这样地理直气壮,就是因为川端病后,身体的价值逐渐降低,日渐丑陋的她距离男权社会的规范越来越远,被遗弃是她必然的命运,男友自不必说,就连母亲也因害怕暴露私房钱而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一步步走向死亡!她那个“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岁数,只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2]137}的没落遗少父亲更恨不得她早死。川端的墓志铭和修饰一新的墓园是对社会现实的巨大讽刺。“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观念和目的”^[3]。张爱玲生活在伦理道德文化浓厚的东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精神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伦理本位主义,这种建立在“父权至上”、“男尊女卑”观念基础上的家庭伦理原则对女人的定位是被动、顺从、等待。因此,和宗法社会中的其他女性一样,川端角色的基调、美丑,全是由男性编制的。男人要她怎样她得怎样。男人说小脚好看,女人得自残;男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人就“存天理,灭人欲”;男人说女人要“三从四德”,女人便“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

子”。女人的无奈与顺从造成了社会对她们的加倍伤害。《花凋》中怪诞、丑陋的身体刻画再现的是被压抑女性内心的无助,这一爱情与亲情的消解,让人看到的是宗法父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无奈与悲凉,揭露的是中国父权制下女性的从属性身份和作为他者的真相。

《善良的乡下人》中的乔伊自幼失去了一条腿,装上假肢后生活基本能自理,为了弥补生理上的缺陷,她发奋读书,30多岁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可她从此就自命不凡。她给自己改名为郝尔珈(Hulga),“最初想出这个名字来,纯粹是由于声音难听……后来,她认为取这个名字是自己最具创造力的表现”^{[4]221}。她觉得知识使她成为一个看穿一切的无神论者,因而对周围的一切都瞧不起,要么对别人的事充耳不闻,要么故意用木腿弄出刺耳的声响以示抗议。她的这种自以为是,使她显得偏执、愚蠢、可笑,也正是这种自大使她最终在与庞特(小说的主人公)的关系中陷于可怜而致命的尴尬之中。她自以为是天才,要给这个天真的年轻人一个生活教训,也想试试自己的诱惑力,于是应约到草棚与这位“善良的乡下人”幽会,她充满自信,可实际上,庞特掌控着一切,一步步诱她打开假肢,目的是满足自己变态的嗜好:骗取残疾女人的假腿和玻璃眼珠一类的东西。终于如愿地看见她的假肢时,庞特把她推翻在地,吻她的时候,“他的眼睛象两个大钢钉子,总是注视着一旁的假腿。”^{[4]226}他把假肢塞进自己的箱子里,扬长而去,摘下了眼镜、失去假腿的乔伊惊得目瞪口呆,被孤零零地丢弃在废弃的仓库里,荡起尘土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

奥康纳因其作品充满怪诞的人物形象而倍受责难,人们普遍认为她冷漠无情,仇视人类。事实上,她以超乎常人的洞察力,以宗教为切入点深刻剖析、试图揭示导致人物悲惨命运的根本原因——人性的恶,其目的在于恢复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我国学者罗婷指出:“弗兰纳里·奥康纳在揭示妇女蜕变中的艰难自我挣扎时……把妇女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与整个社会的不合理状况联系起来,甚至跟人类存在的荒诞状态联系起来……”^[5]奥康纳的作品揭示的是一种人性现实,她致力于表现常人所忽略的现代文明社会中骄傲、自私等容易被人忽视的恶,在为《玛丽·安回忆录》写的序里,她阐述了对这一类恶的观点:“我们多数人已学会对恶无动于衷,我们紧盯着恶的面貌,却常在上面发现我们自己咧嘴

笑的反影,因而并不与其争辩。”^{[6]81}这就不难理解她塑造的乔伊了。乔伊自傲的是获得博士学位,她试图掌控自己的生活,以人代替神,赋予自己自我拯救的能力。为了证明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改名、反叛周围的一切、引诱庞特等,可正是她的自由选择使她陷入尴尬的境地,这里作品要揭示的是乔伊的真正残疾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灵魂上的,是她的信仰体系。

2. 守望之势与疗救之途

张爱玲的《花凋》批判的是那个残害女性的封建男权社会,但面对传统生存的悲凉现实,她取的是守望的态势,既感觉不满又觉得“只能如此”,在不得已的认同下隐藏着无限的伤痛;奥康纳面对宗教的衰落和人性的迷失,试图探索疗救之途。她曾说:“我的读者是那些认为上帝死了的人,至少这些人是我意识到要为他们创作的”^{[6]103}。

张爱玲成长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她的父亲有着一切封建遗少的恶习:挥霍家产,坐吃山空,抽鸦片,养姨太太,对子女缺少爱和责任心。张爱玲少女时被囚于家中,曾患痢疾而得不到充分治疗。在《花凋》中,她以自己切身的体验,以川端为替身书写少女临死前的绝望感。川端病逝前,觉得成了家中的拖累,对自己的病,并没要求家人做太多努力,反而是对家人的不安与愧疚,越发衬出家人对她残忍的无形压迫,自责的背后隐藏的是女性巨大的压抑和绝望。这“硕大无朋的自身”孤独地与所依赖而又无法脱身的“腐烂而美丽的世界”拴在了一起,这“背对背的两个尸首”^{[2]144}既互不相识而又无法摆脱的境遇,道出了她绝望的死和被拉进深渊的无奈与无助。川端的死源于她的性别和女性在传统宗法社会中的价值,病后的她,在一无是处中,被宗法正统所遗弃,被遗弃的川端没有和病魔作斗争,没有丝毫意志的努力,除了向世界遗憾地投射一眼之外,她连抓住世界的念头都没有。“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7]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青春、爱情、亲情、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一只瞧不见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压下来……张爱玲借助川端病中的丑怪,给读者以丰富的感应和深长的回味,在无限的伤痛中明了青春的毁灭不是个人悲剧,而是社会悲剧。噩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

奥康纳出生在基督徒人数占多数的南方,早年受宗教思想的耳濡目染,25岁身染红斑狼疮后,一

直病魔缠身,靠药物和双拐度日。在病痛的折磨与死亡的威胁下,她从宗教中寻求安慰与解脱,是宗教使她获得了正视不幸与死亡的勇气。在死亡面前练就的泰然自若,使她能超然地面对她所处的那个时代,无情揭露常人忽略的现代社会的人性恶。二战后的美国,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泛滥成灾。奥康纳在经济繁荣的浮华背后看到的是美国人道德败坏、信仰丧失的内心世界,人们沉睡在人性恶的黑暗中而浑然不觉。为使麻木的世人猛醒,她采用夸张的手法,以怪诞的人物形象来表达她对世人的关爱。她说:“对于一个基督教作家来说,现代生活充满了令人厌恶的怪诞现象,他的责任是使对这些现象习以为常的读者认识到他们的怪诞面貌……对耳背者你要大喊,对近似失明的,你要画大而惊人的形体。”^{[6]105}她为乔伊安排出人意料的结局,是要让她回到现实中来,让她明白人不能当自己的上帝、不能自我拯救。可现实是,罪人是不会主动认罪的。只有用暴力打碎其固有观念、将其推至无助的边缘,才可能使其猛醒,从而获得拯救。“我发现暴力能把我的人物拉回到现实中来……他们太顽固了,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回到现实中来。”^{[6]119}可见,奥康纳的怪诞是唤醒当代人的宗教意识并让他们接受拯救的手段。庞特对乔伊的精神蹂躏撕掉了她撑起的尊严,打掉了知识与学位带来的自大与狂妄,使她看到了真实的自我,从而获得救赎,可以说,奥康纳的怪诞是打开天堂大门的钥匙。

二、相同的创作手法

尽管《花凋》和《善良的乡下人》在创作寓意上完全不同,但两位作家采取了相同的创作手法——象征主义手法。在希腊语中,“象征”原指一块木板的两半块,人们各执一块,作为好客的信物。后来,它成为秘密活动时相认的一种标志、密语或仪式。象征主义发挥了这个含义,并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对此,张首映趣言:“象征主义文论所谓的象征,首先是指完整的主体意识。它把这个完整的意识分为两半,一半留在意识里,一半以文学形式留给人世间”^[8]。

张爱玲和奥康纳以各种绝妙方式营造意味深长的象征意象,寓无限于有限,寓瞬间于永恒,寓抽象于具象,意蕴丰富而深厚,给人无限的美感和深邃的思考。

首先,两位塑造的畸人本身就是一个象征。“世

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9]。这是大现象家梅洛·庞蒂作出的一个精辟论断。在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里,女性被拒绝或接受,是处在他者和从属被动的地位,女性是被压制和审判的。学者殷海光指出:“在所谓‘专制时代’,中国就是以一个家庭作为中心统治着所有的家庭,由此我们不难想像家庭对于中国文化的建造和发展上居于什么样的地位”^[10]。“家”是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奥秘的一把钥匙,“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不仅导致女性在语言、文化方面的次等或卑下地位的形成,而且长久渗透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习俗之中,影响着女性的心理与人格发展。张爱玲正是通过畸形的个人,让读者看到畸形的家庭和畸形的社会。张爱玲的故事所塑造的与其说是人物,不如说是人的被窒息的天性。《花凋》中女畸人的灵魂是生的欲望被压抑和扭曲了的,是情感上的残疾人,与《花凋》中被压抑、窒息而亡的少女不同,《善良的乡下人》中的乔伊似乎掌控着自己的一切,她虽身体残疾,却通过努力获得博士学位,可正是她的目空一切导致她不幸的结局,她的残疾不是身体上的。

其次,两位作家巧妙运用名字和颜色象征来深化主题。《花雕》中,郑川端谐音“真穿肠”,其伤痛之情使作者对于虚伪的宗法社会的指责真实而深刻,也让人对畸人充满同情;《善良的乡下人》的畸人将表示“欢乐”的名字改成了难听的赫尔珈,并为创新了自我而自得,衬出畸人的自大与浅薄。《花雕》中多次提到白色,如“冷而白的大白蝶”,“她的脸像骨格子上绷着的白缎子”,在中国文化里,白色是死亡的象征,在这里张爱玲借助白色巧妙预示畸人的悲惨结局;《善良的乡下人》中的乔伊“整天走来走去,穿着一条穿了六年的裙子和一件黄色运动衫”^{[4]231},黄色在小说中象征乔伊不健康的身心状况,黄色在西方还有金钱的象征,如“yellow boy”就是金币的别称,这反映出作家对美国社会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的厌恶之情,故事结尾,失去眼镜后的乔伊近视的眼睛却看到了庞特“蓝色身形衬着班驳碧绿的湖水尽力往前走去。”评论家认为这是暗示基督在海面上行走的典故,喻示畸人的灵魂得到救赎,西方文化中蓝色与绿色是生命的颜色。可见,两位作品通过丰富而深刻的象征手法一步一步地预示故事的结局、人

物的命运,并传达出作者对宗教、现实、人性的总体理解和体验,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主题。

三、结语

尽管张爱玲和奥康纳所塑造的女畸人寓意不同,但二者的女畸人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社会学意义,二者的女畸人已成为一个象征,揭示了变态女性的存在状态和作品背后的深层原因——人的异化;二是文学史的意义,中外文学史上,具有变态心理、人格或行为的艺术形象不乏其人,而张爱玲和奥康纳因社会环境的压抑而扭曲,异化的畸人形象,更具象征性,探究的是内心的“最高真实”。她们异常冷峻地审视社会的阴暗面,深入开掘人类灵魂的深处,创作出了深刻的女畸人形象,丰富了文学人物画廊。她们的切入角度和象征主义手法本身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文化批评的模式,使读者能透过她们的女畸人找到她们本来应有的面孔的踪迹并思索畸人悲剧的社会根源。

参 考 文 献

- [1] 奥尔德里. 比较文学:内容与方法[M]. 伊利诺斯州:伊利诺斯厄出版社,1969:36.
- [2] 张爱玲. 花凋[M]// 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 [3]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9.
- [4] 弗·奥康纳. 善良的乡下人[M]// 弗·奥康纳. 公园深处:奥康纳短篇小说集. 主万,屠珍,贺哈定,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 [5] 罗婷. 现代美国妇女的困境与自救——论当代美国女性小说[J]. 外国文学研究,1994 (1):58-62.
- [6] O'CONOR, MYSTERY, MANNERS. In: Occasional Prose. Ed. Sally and Robert Fitzgerald[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69.
- [7] 余平. 失去信任的残疾亚当——张爱玲在小说中对男性形象的颠覆[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2 (8):5-9.
- [8] 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56.
- [9] 赵丽瑾. 花凋中怪诞、丑陋的身体书写策略[J].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 (8):102.
- [10] 殷海光. 中国文化的展望[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98.

(责任编辑:刘少雷)